

第二章

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前的歷史背景

在探討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之前，作者認為對雙邊的歷史背景有所了解是有助於釐清之後兩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因此，本章將針對俄羅斯與阿根廷雙邊的歷史背景，其中包括政治與經濟，做出概述。

在俄羅斯方面，本章將把討論的主軸擺至在蘇聯時期戈巴契夫的政治及經濟改革與進入戈巴契夫時期前的政治及經濟背景概述。而阿根廷方面則是自軍政府從貝龍黨手中奪權後的政治發展與如何將阿根廷的經濟帶往崩潰之路。

雖說戈巴契夫時期的政治改革與阿根廷開始施行民主政治的第一位民選總統阿芳辛有許多相似之處，而阿芳辛的經濟改革卻又與葉爾辛搖擺不定的經濟改革很雷同，但由於本文主要的重點是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的轉型，因此阿芳辛的政治及經濟轉型將於第三章才做出陳述。



第一節 俄羅斯與阿根廷改革前的歷史背景

老人政治下的蘇聯

1975年開始的往後十年間，蘇聯領導階層皆已體弱年邁，相對的蘇聯的統治也早已淪為一個停滯的官僚政治，少數菁英濫用特權，腐敗滋生，社會動盪不安、經濟停滯，黑市市場猖獗。雖然這些寡頭統治階級知道必須進行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基本改革，但是保守的他們，依舊畏懼大幅度的變動，害怕將會對社會、國家及個人本身的政權及利益造成動盪及威脅；因此改革總是無法大刀闊斧的執行，施展的只是在體制內做出細微的改變，當然也就無法挽救已至垂死邊緣的經濟。

1964年10月政變後，布里茲涅夫(Leonid I. Breznev)任蘇共第一中央書記，其執政的特色是對外擴張而對內尋求穩定。在這段期間內，政治方面，黨的角色更加提高，各級的任期穩定。布里茲涅夫只想保持權力與特權，喪失任何改革社會的期望，政治秩序也逐漸僵化。社會方面，一般民眾士氣不振，酗酒怠工的問題嚴重。管理方面欠缺效率，貪污盛行，官僚腐敗。在農業方面，穀物的收割不良，以至對國外進口穀物需求大增；而工業方面，成長率也幾乎呈現零的狀態。

1982年11月克里姆林宮傳出布里茲涅夫的死訊後，很快地由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接手蘇聯共黨總書記。安德洛波夫在高層領導階級中算是較開明的一位。他知道整肅貪污，重振勞動紀律以及進行經濟改革，特別是農業的振興，都是首要之急，但在接任總書記一職後，安德洛波夫的健康每況愈下，在其改革構想都還未能施行前便病逝，在位期間僅一年又三個多月。在安德洛波夫任職期內，只僅僅能做到小幅度的整肅貪污舞弊和加強勞動紀律而已。

1984年2月13日蘇共中央大會，選出契爾年柯(Konstantin U. Chernenko)為新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契爾年柯絕大部分的國家議題皆以延續安德洛波夫路線為主：提高效率及生活水平；加強勞動團體法的權限、責任性、秩序及規律；整編全體勞動機構；引進集約化、科

學技術、大規模的綜合計劃，充實服務部門。¹但契爾年柯在位期間也僅僅十三個月，所以其改革因為時間過短而無法見效。戈巴契夫在契爾年柯的大力提拔下，由蘇共領導階層選出，成為當時最年輕的總書記。

戈巴契夫的政治轉型

1985年3月11日戈巴契夫接任總書記後，就開始積極的推動「加速發展戰略」。在他的著作『大翻修』中曾經提到，「大翻修」是一項急迫的需要，這個社會已成熟到需要改變的時機，它已長期的有此渴望。倘若延遲「大翻修」，便將在不久的未來導致內部情勢的惡化，率直地說，那便是充滿著嚴重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危機。²戈巴契夫也提到唯有透過民主，「大翻修」才能貫徹始終。因此開放是必要的，利用社會的力量也是必須的，因此除了民主化，包括經濟運作和管理的改造之外，再沒有其他的方式。而改造主要的因素，是為了提高集體工作的效率。大翻修最後的結果，我們對它都非常的清楚：那是蘇維埃生活的各方面，徹底的換新；它將給社會主義最進步的社會組織型態；它將在各重大部分，經濟、社會、政治道德等各方面，完全呈露出我們社會制度的人道主義性質。³從上述可見戈巴契夫的改革是全面性的，迫切性的，不同於阿根廷的是阿根廷的改革更大的原因並非自發性的，而是受到社會大眾龐大的壓力所致。但兩國改革的主因都還是源自於國內嚴重的經濟問題。

1985月蘇共中央4月全會上，戈巴契夫提出「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初步改革構想。加速發展戰略的主要意涵在於計劃經濟增長速度的進步，主張建立完善的經濟體制和管理系統，加強紀律與制度化的施行，提倡擴大企業及聯合體的權力，部分小型合作社和家庭企業的合法化。也提出重建(Perestroika)的概念。「重建」則包括國營經濟市場主義化，極權轉向民主化。但在戈巴契夫「新思維」一書中，也提到對各個領域的「重建」，經濟、民主、政治、社會道德、科技、文化等。

¹ *世界週報*（日本，1984-3-24），p. 26-27。轉引自伊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台北：五南，1994），pp. 53-55。

² Mikhail Gorbachev，陸宗璇譯，*大翻修：蘇俄的未來*（台北：黎明，1989），p. 4。

³ Mikhail Gorbachev，陸宗璇譯，pp. 22-25。

這樣的舉動不免影響到官僚和經理人們的利益及黨內不同意識型態的反彈聲浪。對官僚而言，他們不只控制國營企業，同時也擁有特權，他們並不在乎國家進步與否，他們所希望的是經濟能夠好轉，但是在不損害其自身的利益的前提之下。對經理人們而言，他們透過壟斷的方式掌握國營企業，可以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些阻礙使戈巴契夫第一階段的改革未能有所成果。再加上「加速」本身並未觸及到體制外的改革，因此加速戰略並無法有效的施行，於是戈巴契夫在 27 大上，決心對經濟做出根本的改革。

1986 年戈巴契夫將其改革轉向政治面，因為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戈巴契夫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現象，其主要的阻力來自保守勢力及中央各部會官僚與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因此戈巴契夫深刻的了解到，必須透過政治的改革以帶動經濟改革。藉由社會大眾的力量來排除經濟改革的障礙，進行重建，剷除異己，讓他的改革通行無阻，不但可以清除保守派的腐敗官員，亦可得到開明改革家的頭銜。因此在 27 屆蘇共大會中，戈巴契夫提出公開性(Glasnost)。公開性主要在於：一，言論的自由與開放和官方媒體的公開性；二，推動所有政府機關淨化和現代化；三，在制度上和結構上給予彈性與更直接的權力。戈巴契夫在這段期間大幅的更換了官員幹部，政治局 12 位委員就更換了 5 位，黨中央 24 位部長被更換了 10 位，共黨書記 15 位則更換了 4 位，地方第一書記 150 位更替了 50 位，中央部會 320 人中也更替了 138 人。⁴從人員的更替中可看出戈巴契夫改革的決心和其權力的鞏固。但「公開性」的確是一項非常危險的遊戲，批評的言論頓時如雪花般的湧進媒體，許多蘇聯的黑暗面大量的被揭發，官員的貪污腐敗、社會的弊病、歷史的翻案等，動搖了整個社會，也讓戈巴契夫和蘇聯本身在之後付出相當的代價。

到了 1988 年在蘇共第 19 黨代表大會中，戈巴契夫再次提出了政治改革，這次改革主要的七項基本任務是：第一，使千百萬勞動者以實際行動參與管理國家；第二，擴展公民、政權機關、黨與社會組織、勞動集體的主動精神建立條件；第三，使所有的階級與社會團體能自由組成及表達其興趣與意願；第四，保障每一個民族有自由發展的條件，鞏固他們的友誼與平等權力的合作；第五，根本鞏固社會主義法制與法律，俾能消除篡奪權力的機會，有效對抗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可靠的保障憲法權力與公民權，及履行公民對國家與社會的義務；第六，根據列寧的觀點：共產黨的角色是社會的政治先鋒隊，蘇維埃國家是人民政權的工具；明確劃分黨與國家的機能；第七，建立

⁴ Ernest Mandel, *Beyond Perestroika: the Future of Gorbachev's USSR* (London: Verso, 1991), pp. 70-73.

有效的機構，在考慮國內與國際條件變化下，使政治體制能適時地自我更新；對一切生活領域能夠更積極發展及運用社會主義民主與自治精神。⁵

戈巴契夫的政權在此時已經相當穩固，他也有效的利用社會的力量透過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將政敵鬥倒。但蘇聯的民眾對現況的不滿也與日俱增。戈巴契夫利用政治參與來製造民眾要求增加經濟改革的壓力。這樣的確如他所期望，但同時卻也使共黨失去武力鎮壓社會的能力，而使其公權力受到威脅。社會大眾一旦嚐到自由的滋味之後，就會要求更多的權力，而一旦社會被解放，就難以再加控制。接踵而來的大規模社會運動開始浮現，被壓制許久的危機也爆發出來。激進的民主化和民族自決運動被戈巴契夫無意間觸動，引爆。激進的民主化要求全面的開放與多黨民主，要蘇共放棄一黨專政，建立西方式的民主體制。而民族自決運動則訴求各個加盟共和國有獨立的主權地位，可以自行決定是否留在蘇聯。激進的民主化和民族自決一旦付諸行動，必定導致蘇共政權的瓦解和蘇聯的崩潰⁶，而這一切都超乎戈巴契夫當時所能預料的。

戈巴契夫的第一件民族衝突事件發生在 1986 年 12 月當戈巴契夫將哈薩克共黨第一書記庫那耶夫(Dinmukhamed Kunayev)撤換，結果造成大規模的抗議事件。1987 年克里米亞人、韃靼人和波羅的海國家也出現抗議事件。隔年，緊接而來，亞賽拜然和亞美尼亞兩個高加索共和國為領土問題發生武裝衝突，而在同年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獨立運動開始展開。1989 年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主張獨立人民陣線佔上風。9 月，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項名為「黨在當前狀況下的民族政策」(The Nationalities Policy of the Party In Present-Day Conditions) 的文件，而這項文件也視為蘇聯共黨的官方立場。文件主要內容如下：第一，將蘇維埃聯邦轉型為一個真正的政治與經濟實體；第二，擴大所有形式與類型的自治民族實體的權利與權力；第三，確使每一個民族享有平等權益；第四，為民族文化與語言的自由發展創造條件；第五，基於民族理由，應強化保證，確使人民權益不受束縛。⁷但此文件的發表，卻為時已晚，民族獨立的意願已經水漲船高，一發不可收拾，民族獨立運動有如浪潮般席捲而來，而族群的危機也帶蘇聯走向瓦解的道路。

⁵ 王承宗，「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研析」，*問題與研究* 27, 12, 9 (1988): 14-15。

⁶ 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台北：東大，1998），pp. 86-87。

⁷ 戈巴契夫，譚天譯，*俄羅斯的教訓*（台北：貓頭鷹，2001），pp. 141。

1990年蘇共召開中央全會，其中討論到兩個政治民主化的要點：第一，蘇共決定實行總統制；第二，修改「蘇聯憲法」第六條，容許其他政黨的存在。⁸在同年3月13日，在蘇聯人代會進行修改憲法第六條，刪除共產黨為唯一合法之政黨。同時也通過了關於蘇聯總統職位相關法令及條文。⁹經投票後，由戈巴契夫當選蘇聯第一任總統，而這象徵著戈巴契夫權力更進一步的鞏固。3月17日舉行的公民投票，決定蘇聯是否繼續存在，雖然結果大多數贊成蘇聯繼續存在，但是聯盟條約卻一直遲遲未得到加盟共和國的簽署。

在政治上權力已完全得到鞏固的戈巴契夫，轉而開始採保守路線，而著手進行經濟改革。但政治的動盪已經對經濟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再加上「加速」與「重建」並未帶來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的穩定，因此社會大眾已對戈巴契夫失去信心。而戈巴契夫後期所拔擢的保守主義分子無法容忍他政治路線的轉換，認為新聯邦條約代表蘇聯的解體，所以在8月條約簽訂的前夕發動政變。

1991年8月19日副總統亞納耶夫(Gennady Yanaev)發佈一項命令，表示戈巴契夫「基於健康理由已經不可能」行使總統職權，而宣佈蘇聯部分地區進入緊急狀態。政變在3日後宣告失敗。政變後的蘇聯，加盟共和國紛紛求去；而對葉爾辛而言，蘇聯的解體，意味著俄羅斯的獨立，和其個人權力的獨立，可以不再受到戈巴契夫的左右。因此就在同年的12月8日，俄羅斯、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三位領導人會面，共同發表聲明：「做為一個國際法中實體以及一個地緣政治現實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已經不再存在。」，同時也簽署了一項協議，建立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 CIS)，¹⁰埋葬了蘇聯。

軍政府領導下的阿根廷

反觀阿根廷，在貝龍的領導下，50年代末又退回到施行有限的民主，而在1976年軍政府接管阿根廷後，改由一種新形式的政治制度「官僚威權」(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來統治阿根廷。¹¹但在

⁸ 畢英賢，「蘇聯的民主化與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與研究* 29，7，4 (1990): 9。

⁹ Gordon B. Smith, *Soviet Politics: Struggling with Change* (Hampshire: Macmillan, 1992), pp. 123, 136.

¹⁰ 戈巴契夫，*俄羅斯的教訓*，pp. 215-216。

¹¹ Samuel P. Huntington, 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 (台北：

貝龍黨(Perón)伊莎貝爾貝龍(Isabel Perón)執政的末期，阿根廷的經濟及社會皆已陷入動盪不安的狀態，1976年阿根廷國家的財政赤字已達到GDP的15.1%，而物價也通貨膨脹到499%¹²，在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狀況下，軍人於當年的3月發動了政變，再一次的將阿根廷帶上軍政府統治之路。

威權的軍人統治依舊無法將阿根廷帶來繁榮和穩定，反之在政治上，因為軍人的權力爭奪導致政治的不穩，而在經濟上，他們也無法有效的解決阿根廷嚴重的通貨膨脹、經常帳的赤字、不斷劇增的外債等問題。

1976-1981年之間由陸軍上將維德拉(Jorge Rafael Videla)統治阿根廷，在其統治期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會充滿了恐怖，上千人被捕、失蹤、或被放逐，而在1978-1981年短短的三年之間，阿根廷的外債多出了原本的三倍，財政方面也一直維持赤字的狀況。無法振興的經濟毀壞了國內的工業。上述的種種也替維德拉的政治生涯畫下了一個休止符。

軍方在1981年任命維歐拉(Roberto Eduardo Viola)為總統，在維歐拉統治阿根廷的期間，他有限度的容許了一些團體的組織，1月7日在公民激進聯盟鼓吹之下成立了全國多黨聯盟(Multipartidaria Nacional)。此聯盟成為與軍政府協商的關鍵因素之一，而且天主教教會也通過了「教會與全國共同體」(Iglesia y comunidad nacional)的文件，也促進了阿根廷民主化的發展¹³。

在經濟混亂社會持續不安的狀況下1981年12月軍方再次撤換總統，由卡爾惕耶律(Leopoldo Fortunato Galtieri)領導阿根廷，雖然軍方不斷的更換領導人但是還是無法控制已經失控了的阿根廷，民眾對軍方完全失去信心，隔年，1982年，在墨西哥外債危機發生之前，阿根廷的銀行早就已經紛紛宣佈倒閉。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下，人民渴望民主的歸還，於同年的3月舉行了一場浩大的遊行。訴求軍政府的下台，此時發生阿根廷與英國爭執福克蘭群島的歸屬權事件，卡爾惕耶律清楚的知道、也希望能透過與英國的戰爭凝聚民眾的愛國心和團結力，同時能將民眾對軍政府不滿的焦點轉移至戰爭上，且若此戰爭阿根廷可以獲得勝利，軍政府的威望也可望加分，再次贏得民心。除

五南，1994)，pp. 16-17。

¹² Maria Victoria Murillo, *Labor Unions, Partisan Coalitions, and Market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1.

¹³ Manuel Alacantara Saez, 熊建成，洪惠紋譯，*拉丁美洲政治體制 Sistema Politico de America Latina* (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p. 21。

此之外，阿根廷政府也誤解了美國軍方的意思，一廂情願的以為美國將全力幫助阿根廷在福克蘭群島上與英國對抗，因此經過多方面評估後軍方決定對英國出兵，收復福克蘭群島(Islas Malvinas)。¹⁴福克蘭戰爭的挫敗削弱了軍人的權力，使得缺乏效率與專業執政特色的軍政府權力盡失，後來也成為軍政府退出執政舞台的關鍵因素之一。福克蘭群島戰爭雖然促使了軍政府的垮台，但也使得阿根廷當時的經濟局面雪上加霜，更加的惡化，通貨膨脹更為嚴重，外債也更為大幅增加。

1983年國內民眾為了表示對軍政府的不滿，罷工、遊行、示威等舉動連連不斷，軍政府在種種壓力下，不得不將民主還至於人民手中。在同年的10月舉行了總統的選舉。阿芳辛(Raúl Alfonsín)意外的在1千4百75萬餘張有效選票中，以7百65萬餘票，52%的得票率，脫穎而出，而向來擁有執政權的貝龍黨(Partido Juslicilista)在錯愕與傷痛中眼睜睜的看著阿芳辛所屬的激進黨(Unión Cívica Radical)接掌國家政權。

蘇聯和阿根廷新的領導人，此時所面對的都是混亂不堪的社會亂象政治權力有待鞏固和嚴重經濟的問題。但是蘇聯的改革是政府自發性的，而阿根廷則是受到經濟的困境，人民渴望自由民主的到來，才使得軍政府喪失政權。蘇聯的政治改革是在經濟改革無法推動之下所延伸的產物，阿根廷的民主政治則是軍人政府被推翻後的產物。但無論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或軍政府主政的阿根廷，當國內經濟無法滿足民眾需求時，新的領導人就必須面臨改革的難題。但新上任的領導人，不但得面對混亂的社會現狀、嚴重的經濟問題更需面臨權力的鬥爭與權力的鞏固。而權力的鞏固又與改革的阻力大小息息相關，因為改革意味著利益的重組，因此必定有特定的一些人利益受損，因此阻礙改革也成為必然的現象。

¹⁴ Daniel Muchnik, *Argentina Modelo : de la Furia a la Resignacion- Economia y Politica entre 1973-1998 (阿根廷模式：從狂暴到屈服~1973年到1998年之間的經濟與政治)* (Buenos Aires: Manantial SRL, 1998), p. 138.

第二節 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前的國內經濟

史達林後的蘇聯經濟

1953年史達林死後，蘇聯的社會經濟逐漸複雜化，在中央統治的計劃經濟下，因為資源與勞工都已經充分就業，因此瓶頸開始浮現，除此之外中央統治經濟帶來了國民經濟管理權限過分集中、機構臃腫、官僚主義嚴重、經濟領導機關無法有效的指揮生產、部門領導原則導致本位主義、阻礙地方與企業積極性的發揮等問題。¹⁵要帶動停滯的經濟則必須仰賴有效的生產力，但學者柯奈爾(James Kornai)指出：不同層級垂直的經濟無法有效率的與市場發生直接的關係，因此無法有效鼓勵企業發揮其生產最大效用及追求利益。同時因為軟預算的原因，導致企業不需自負盈虧，而紀律散漫怠惰。而學者挪維(Alec Nove)則認為企業經理人對市場資訊的缺乏也是導致企業效率不彰的主要因素之一。¹⁶蘇聯領導階層了解必須在經濟上做出改革，才能解決當前的問題，因此接下來的幾位領導人，都做了一些計劃體制內的經濟改革，但由於所做的改革都還是屬於「調整」的規範，因此並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上任後，在1956年召開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自1957年開始，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將取代傳統部會，協調企業經濟活動的方案。中央及加盟共和國主管生產的部會大多撤銷，國家經濟委員會也被取消，把管理移交給105個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委員會，中央管轄的工業產值在全蘇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下降到6%。¹⁷改革所希望預見的是減少官僚，在同一地區的企業能夠有更好的分工關係，使提昇經濟。但結果所造成的是地方市場封閉，地方主義猖獗，這樣負面的結果也馬上反映在經濟帳面上。因此理所當然的，赫魯雪夫的經改宣告失敗，而除了經改失敗以外，經改過程中也影響到許多人的利益，因此樹立了不少政敵，導致最後喪失權力。

之後由布里茲列夫主政，布里茲涅夫初期的改革主要有三個重點：一，擴大經營自主管理權，以提高企業的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二，

¹⁵ 王愛珠，*蘇聯東歐經濟改革概論*（台北：水牛，1991），p. 18。

¹⁶ Terry Cox, *From Perestroika to Privatisation* (Aldershot England: Avebury), 1996, p. 11.

¹⁷ 王愛珠，p. 19。

管理經濟從行政方法與經濟方法相結合，逐步轉向以經濟方法為主，加強經濟槓桿原理；三，加強企業集體和職工個人的物資刺激。¹⁸1970年代蘇聯和東歐興起了合併企業的風潮。1973年3月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下達指令，要求各部研擬計劃合併所屬的企業，並廣泛建立全蘇工業集團。另外建立研發和生產一體的科學生產集團。建立集團的目的在於減少中央部會對企業的干預，增進分工和技術的效率，但所得到的結果卻是增加了一個多餘的行政層級，提高了整個經濟組織運

表 2-1 蘇聯時期年成長率

	1966-70		1971-75		1976-80		1981-85	
	計劃	實質	計劃	實質	計劃	實質	計劃	實質
物質生產淨值	6.9	7.1	6.7	5.1	4.7	3.8	3.4	3.2
工業實質產量	8.5	8.4	8.0	7.4	6.3	4.4	4.7	3.7
建設		7.4	7.5	6.2		2.1		
實質農業產量	4.5	3.9	3.7	0.5	3.0	1.0	2.5	1.1
國民平均所得	5.4	5.9	5.5	4.4	3.9	3.4	3.1	2.2
投資	8.2	7.5	6.7	7.0	3.2	3.4	1.5	3.5
工業勞動產能	6.0	5.7	6.8	6.0	5.5	3.2	4.2	3.2

資料來源：Jacques Sapir, 'Crises et Mutations de l'Économie Soviétique', *La Nouvelle Alternative*, no.4, 1986.轉引自 Ernest Mandel, *Beyond Perestroika: the Future of Gorbachev's USSR* (London: Verso, 1991), p. 4.

表 2-2 蘇聯時期年成長率(平均率)

	1951-56	1956-60	1961-65	1966-70	1971-75	1976-79	1981-85
國家收入							
官方資料	11.4	9.1	6.5	7.7	5.7	4.2	4.0
CIA 估算	6.0	5.8	5.0	5.5	3.7	3.0	1.5-2.5
工業產出							
官方資料	13.1	10.4	8.6	8.5	7.4	4.7	
CIA 估算	11.3	8.7	7.0	6.8	6.0	3.5	

資料來源：Mark Frankland, *Observer*, 7 December 1980.轉引自 Ernest Mandel, p. 6.

¹⁸ 王愛珠，pp. 21-22。

作的成本。生產效率一再繼續下跌，因此蘇共在 1979 年 7 月又推動新的經濟改革，主要在建立一個以附加價值為主的企業表現指標，希望透過這樣的機制生產者能夠節約物料，控制成本，因而增進經濟效率。於是劣質品大量產出而資源分配的效率依舊無法改善。¹⁹布里茲涅夫的經濟改革都無法奏效，原因主要還是歸咎於無法突破傳統的體制框架，中央依舊高度集中控制經濟，市場無法真正反映需求，資源無法有效運用，生產效率也無法提高。

1982 年安德洛波夫繼任蘇共總書記後，首先擴大農業集體承包制。之後的經濟改革重點包括：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修改企業考核指標，使勞動報酬和其他福利與最終生產成果掛勾。而安德羅波夫的經濟改革依舊如同以往的經濟改革，還是處於計劃經濟體制內的變動，中央依舊握有主導權，企業的自主權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擴大，而市場機制依舊被排除在外。安德洛波夫在任僅僅 15 月即病逝，而契爾年科在上任十三個月後，還沒來的及做出任何改革前即病逝。

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

繼安德洛波夫後，1985 年 3 月由戈巴契夫擔任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所面對的是一個經濟成長鈍化的蘇聯，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第一，軍費負擔增大；第二，農業不振；第三，勞動開發不足；第四，經濟基礎設備落後；第五，技術進步停滯；第六，資源開發漸向北、向東移，成本過高；第七，計劃管理體制僵化、缺乏效率等等。²⁰所以戈巴契夫非常清楚改革是必須的，若不改革，蘇聯的經濟即將面臨崩潰。因此在 1985 年 4 月中央蘇共全會上戈巴契夫提出加速社會經濟發展與改革體制的概念。

在 1986 年蘇共 27 大戈巴契夫提出「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和「根本改革經濟機制的基本方針」戰略主要義涵在於，在第十二個五年經濟計劃中增加投資，平均年投資增長率由上期的 3.7% 增加到 4.9%，投資佔國民所得的比重也將由 1985 年的 25% 上升到 1990 年的 27.6%。「加速」將使蘇聯的機械工業在 1990 年時達到世界水平，在 2000 年時蘇聯經濟規模將超出 1985 年的 2 倍，勞動生產力超過西方

¹⁹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1996），pp. 107-108。

²⁰ 伊慶耀，「戈巴契夫執政後的蘇聯」，*問題與研究* 26，11，8（1987）：26。

國家的水平。²¹但「加速」基本上沒有觸及到傳統體制的改革，使加速戰略根本無法推行。

「加速」其中也包括發佈了反酗酒、工資改革和建立國家品管的制度。反酗酒帶來的是黑市私酒猖獗，國家稅收減低，財務赤字上升，也間接造成後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工資改革則屬調整範圍，但因企業依舊施行軟預算，並無自負盈虧的危機，因此不會面臨破產的問題，因此就業保障依舊持續。而品管制度方面，因為國營企業傳統性的獨佔市場，使消耗與生產無法畫上等號，消費者的需求並不被重視，因此生產品質低劣，為了改善此狀況，戈巴契夫建立國家品管制度，產品品質標準升高，而導致許多產品無法出廠，產量下跌，生產目標無法達成，使工人獎金凍結，導致勞工反彈。1987年蘇共就調降了投資的目標。戈巴契夫上任的前兩年，在經濟上並無實際的成就(表 2-3)，政府對市場需求的資訊缺乏、投資比例的失調、不願增加對西方的依賴、出口下降等因素，也使國內嚴重的經濟問題無法得到減輕。

「加速」只是體制內的改革，所以並沒有深入解決問題，雖然在行政機關和人員上做出大幅的變動，但是官僚的運作使在位者的利益可得到最大化，因此體制內的調整是無法讓蘇聯垂死的經濟得到紓解的。學者西露尼(Vasily Selyunin)指出蘇聯的官僚過於龐大，只能完全的刪除或摧毀無法重建。大部分的官僚和人民在「害怕獨立」和「嚴酷經濟現狀」的保守壓力之下，舊的機制將抗拒所有的挑戰，所以傾向於破壞和懷疑引進的新機制。所以結果就是看不見成果的改革，也讓人民懷疑改革的成效。²²因為無法達到所預期的效果，改革遲遲無法使國家經濟有起色，戈巴契夫意識到單推行經濟改革是難以達成目的，必須同時進行政治改革，才能激起人民的主動性。於是在 1986 年開始大力倡導「民主化」與「公開性」，殊不知自己已為日後蘇聯

表 2-3 戈巴契夫時期年成長率

1986-1990	計劃
物質生產淨值	3.5-4.0
工業實質產量	3.9-4.4
建設	N/A
實質農業產量	2.7-3.0
國民平均所得	2.5-3.0
投資	3.5-4.0
工業勞動產能	4.2-4.8

1981-85	
國民所得	
官方資料	4.0
CIA 估算	1.5-2.5

資料來源: Jacques Sapir, 轉引自 Ernest Mandel, p. 4.; Mark Frankland, *Observer*, 7 December 1980. 轉引自 Ernest Mandel, p. 6.

²¹ 吳玉山, *遠離社會主義: 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 p. 117.

²² Peter J. Boettke, *Why Perestroika Failed: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37.

的瓦解埋下了危險的種子。在透過「民主化」與「公開性」，戈巴契夫有效的打擊他的政敵，鞏固自己的權力。

1987年6月的中全會中，戈巴契夫提出經濟體制的改革，在會中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其中主要的內容可歸納為五點：第一，擴大企業自主權，企業必須自負盈虧，而國家也將施行硬預算；第二，根本改革過於集中經濟制度，由行政領導方法轉向經濟領導方法；第三，改革計劃、價格形成、財政信貸機制，以及實行批發貿易；第四，建立新的組織機構，提高地方機關在經濟和社會中的作用；第五，將過分集中的指令性管理體制改為民主的管理體制，實現自治。²³而這次的經改，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採用「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引進初級的市場化。但在實踐過程中依舊困難重重，因為國有企業法與價格改革並無一致性，雖然擴大企業自主經營權，但是在價格和產量上依舊由國家操控。除此之外，依然有下列問題存在：保守勢力依舊普遍存在，對抗改革、人民對改革的熱心及信心已降低、黨幹無能，黨紀不振、民族紛爭、非官方組織眾多、民生日用必需品依然不足、財政赤字嚴重、部分企業經營不善、物價改革未能推行、農業與外貿表現不佳。²⁴從理論上來說，市場社會主義是由統治經濟出發，一方面引進市場機制，一方面保留公有制。但由於不進行私有化，企業仍屬國家所有，因此不會聽任國有企業破產，而硬預算也就無法有效實行。由於企業的預算是軟性的，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企業傾向於採取擴張政策。而軟預算約制是造成通貨膨脹的財政因素。

六年經濟健康計劃

在經濟上戈巴契夫無法有所突破，事隔不久，東歐開始起變化，民族獨立運動開始一波接一波的接踵而來。而國內的經濟也不斷持續惡化，為了因應不斷惡化的經濟，蘇共方面在1989年12月蘇共中央全會和蘇聯第二次人代會通過為期六年的健康化計劃，1990-1992以經濟健康化為主，後三年1993-1995則全面向市場經濟過度。政府同時擬定配套的改革措施，先後通過所有制法、土地法、地方自治法、蘇聯統一稅收法、社會主義企業法等，希望透過經濟的調整，改善財務狀況，結果引發人民搶購風潮。民怨四起，因而不得不放棄此計畫的施行。後來由國家科學院士沙塔琳(Stanislav Shatalin)提出「500天

²³ 王愛珠，pp. 28-33。

²⁴ 畢英賢，「一九八八年蘇聯政經改革與難題」，*問題與研究* 28，6，3 (1989): 20-22。

綱領」，從 1990 年 10 月 1 日開始，500 天內實行穩定化政策，壓制通貨膨脹，改變所有制結構，開放部份物價。但因為過於激烈因此遭到否決。最後由戈巴契夫提出「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度的基本方案」，方案的主要目標以穩定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為主。但改革還是有名無實，蘇聯的經濟不但未見起色，反而出現了政治、經濟、社會全面性的危機。因此蘇聯政府於 1991 年 4 月 22 日又提出「反危機綱領」。但單純的經濟緊縮已經不再能挽救惡化的經濟危機，有限的價格開放反而觸動了惡性的通貨膨脹。蘇聯的經濟狀況進一步的惡化，戈巴契夫和蘇共政府的聲望也跌到谷底，三個多月後，八月政變接著爆發。到了年底蘇聯終於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中宣告瓦解，12 月 8 日由俄羅斯、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三位領導人共同簽署了一項協議，建立獨立國家國協，埋葬了蘇聯。

上述的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戈巴契夫的改革過程中，不斷地在經濟與政治的意識型態中游離。他接任總書記後，首先關注經濟發展的問題，著重在農業的改革，在無所成果後接著在 1986 年又轉向政治上的改革，但並未放下經濟上的改革，同時對意識型態給予高度重視。這種複合式策略，使他在 1987 年夏天提出經政措施。1987-89 又多次致力於農業改革，企圖施行承包制，未能成功，於是又轉回政治改革，想以政治改革來促使經濟改革，同時力圖在經濟改革中有所突破，扭轉日益嚴重的問題。²⁵這樣的思想與阿芳辛似乎有所同，經由政治上的掌控推行經濟改革，所帶來的阻力將會較小。但因為政策的無法貫徹，經濟問題又不斷深化，在遇到問題和阻礙時，不但沒有修正和去解決問題使狀況獲得改善，而是想另外找尋新的改革項目或政策，以求突破，結果是造成政策的搖擺不定無法堅持，也因此一事無成。

阿根廷軍政府時期的經濟

在軍政府奪權前，經濟在 1975 年開始下滑，主要原因是受到歐洲共同市場不再向阿根廷採買牛肉，披索貶值和工會抗議越演越烈所致。由貝龍夫人所領導的政府所採行的措施是將披索貶值 100%，將燃料稅上漲 175%，電費和其他公共費用也因應上揚了 75%。²⁶這樣的

²⁵ 薩公強，pp. 95-96。

²⁶ Todo lo que Quiere Saber sobre Argentina (所有你想知道有關於阿根廷的事)，<http://www.todo-argentina.net/>。

結果造成社會大眾及工會的不滿，罷工、遊行、示威活動不斷，社會陷入無秩序的混亂；因此貝龍夫人在 1975 年 11 月 6 日辭去總統的職位。而軍方趁著群龍無首，社會動盪之際，在隔年的 3 月 24 日政變成功，取代了貝龍政府。但威權的軍政府並無法對阿根廷經濟帶來新的氣象。

在軍政府執政期間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將阿根廷的工業摧毀。阿根廷的產業危機在 1975-1976 年之間開始逐漸浮現，之前工業過度的擴張、國內需求的下降、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499%，1976 年)，財務的混亂及伴隨著財務問題而產生的外債，使阿根廷的工業每況愈下，許多製造商皆紛紛尋找外銷之路即對自己企業本身的開支節流²⁷。除此之外因為受到貨幣主義思想和通貨膨脹的影響，許多投資人偏向於做出短期投機的投資，而不再投資在長期生產的製造業上。再加上當時阿根廷政治局面的不穩定，政府官員皆無暇即時對產業的危機做出補救之措施，改善當時產業的問題，使得其產業危機不斷的惡化。

軍政府將國家經濟的籌碼全盤下注在農業上的幾個月後，因為國內對工業用品的需求因而不得不開放進口；²⁸另外也為了吸引外資及挽回投資人的信心，新上任的經濟部長德侯斯(José Alfredo Martínez de Hoz)的當務之急就是將經濟穩定下來。德侯斯經濟的思想是信奉正統的新保守主義，與西方國家相近。因此軍方認為，為了得到國際社會的貸款，德侯斯為最佳人選。而德侯斯本身認為，阿根廷的經濟問題源自於 30 年代，因為過盛的國有部門和國家對市場的過度管制，高通貨膨脹率和低生產率成為自然衍生的後果。國家代替了市場機制配置資源，也理所當然的歪曲了經濟結構而勒死了經濟。而在貝龍時期的高進口關稅保護政策之下，國內產業自然獨占了市場，因此失去了生產誘因，產品的品質惡劣，成本低，生產器具未被充分利用，但企業並不關心國家經濟的劣與否，只在乎薪資的調漲。在這樣的狀況下最大的受害者是：第一，國家，因為為了提供企業生產補助津貼，支撐過度膨脹的官僚和國有企業的財務問題，使得財政赤字節節上升；第二，消費者，因為不斷被通貨膨脹稅及價格影響；第三，農物生產業者，因為從其身上所課征的稅被轉為補貼工業和城市的居民。因此德侯斯認為開放市場、開放國外競爭、國家退出市場補助者的角色，只設定總體經濟指標、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縮編行政官僚和刪除

²⁷ Schuarzer Jorge, *La Industria que Supimos Conseguir (在我們認知下可尋得的產業)* (Bs. As: Ed. Planeta, 1996), pp. 285-8.

²⁸ Schuarzer Jorge, p. 287.

對農業部門的差別待遇都是必須的。²⁹

另外一項重要的政策就是開放市場，透過市場的開放來吸引外資，但德侯斯最經典的政策莫過於採用了預先宣告匯率貶值的“小表”(tablita)政策，此乃所謂的“sliding peg system”，透過當日宣佈外匯率的方式將披索的貶值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內。這種將通貨膨脹率控制在貨幣增長率之下(rate of monetary expansion)³⁰的政策是沿出於芝加哥大學的“單一價格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匯率的浮動將隨著波動的底基來變更，而創造出一個經濟人可以透過匯率浮動的圖表察覺到政府壓制通貨膨脹的具體表現³¹，也因而可以增加投資人信心即吸引更多的外資。這樣的政策剛開始的確奏效了，通貨膨脹也迅速被有效控制，在1980年通貨膨脹已降至100%以下，但實際上，通貨率應該已經超出每日“小表政策”所宣布匯率的50%-60%之多。且透過這樣的機制，投資人就像是頂著一個“無風險”的光環，大肆的賺取高利率和低匯率之間的利益。³²而由於私人部門的外債和大部分海外流失的資金是由政府擔保及補助，因此私人部門也不斷的大量對外國借出資金，這樣的結果深深的影響到了生產部門。為了帳面上的赤字，軍政府只能向國外舉債，而也習慣於向國際社會貸款來平衡收支，因此漸漸的變成了一種惡習。在軍政府執政期間，阿根廷的外債開始暴增。

上述政策並無法長期的達到穩定市場價格與壓制通貨膨脹的效果，市場的開放、利率持續性的高漲、舉債的惡習、入口貿易的鼓勵與國內本身需求量的改變，衝擊著本土的產業，也使阿根廷的經濟在接著後面的十年為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在1980年經濟危機逐漸浮現，經濟局勢的惡化導致了1981年的經濟一路下滑。

1980年，進口的商品價格偏低而本土的產品相較之下，根本無法與進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因此不少工廠紛紛倒閉或宣佈破產。因為經濟狀況不佳，德侯斯被撤換下來。1981年上任的經濟部長亞雷曼(Roberto T. Alemann)，面對工業界的不景氣，亞雷曼所採行的補救措施，是以減低經濟失衡的狀態為主。採行的各項反通貨膨脹政策，

²⁹ Luigi Manzetti,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The Argentina Case* (New York: Praeger 1991), pp. 94-95.

³⁰ James D. Rudolph, *Argentina: a Country Study* (United States: The Secretary of the Army, 1985), pp. 128-129.

³¹ Jeffrey D. Sachs, *Developing Country Deb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Vol.2 Country Studies: Argentina, Bolivia, Brazil, Mexico* (USA: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5.

³² Jeffrey D. Sachs, pp. 45-6.

表 2-4 阿根廷總體經濟指標

年	GDP 成長	通貨膨脹 (CPI)	經常帳/ GDP	實質匯率	貿易條件
1974	5.7	40.2	1.3	71.2	117.8
1975	-0.4	334.1	-2.2	36.9	111.5
1976	-0.5	347.5	2.9	46.4	95.8
1977	6.4	160.4	3.9	50.7	92.7
1978	-3.4	169.8	4.9	64.7	83.5
1979	6.7	139.7	-0.1	83.4	88.4
1980	0.7	87.6	-6.1	100.0	100.0
1981	-6.2	131.3	-2.7	69.5	107.0
1982	-4.6	209.7	3.3	48.9	89.0
1983	2.8	433.7	3.9	58.8	86.0
1984	2.6	688.0	4.2	58.4	93.0

資料來源：Carta Económico,轉引自 Jeffrey D. Sachs, *Developing Country Deb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Vol.2 Country Studies-Argentina, Bolivia, Brazil, Mexico* (USA: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4.

表 2-5 阿根廷外債表 (以百萬美元為計算單位)

年	公共部門	私有部門	總額	淨外債/出口*	Debt/GDP(%)
1974	4,558	3,410	7,968	1.7	20.4
1975	4,021	3,854	7,875	2.6	18.6
1976	5,189	3,090	8,279	1.7	18.6
1977	6,044	3,635	9,679	1.1	19.2
1978	8,357	4,139	12,496	1.1	23.9
1979	9,960	9,074	19,034	1.2	30.2
1980	14,459	12,703	27,162	2.5	37.3
1981	20,024	15,647	35,671	3.5	48.1
1982	28,616	15,018	43,634	5.4	60.3
1983	32,196	12,585	44,781	5.4	59.5
1984	37,628	10,193	47,821	5.6	60.5

Note : * Net Debt/Export

資料來源：Carta Económico,轉引自 Jeffrey D. Sachs, p. 136-137.

都不外忽是在減低經濟失衡的狀態與壓制通貨膨脹，其中以減低經濟預算、緊縮貨幣、消耗品的調漲與公務人員薪資、退休金、補助金等經費的凍結等方案。雖然一連串的經濟改革措施不斷的更新與改變，但卻無法有效的改善阿根廷的經濟問題，因此在 1982 年 8 月，新的經濟部長維特(Jorge Wehbe)上任。維特希望藉由 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幫助，來改善阿根廷嚴重的經濟問題³³。而另一方面，新上任的中央銀行總裁卡瓦落(Domingo Cavallo)在不接受任何上級的命令與擺佈之下，企圖控制貨幣量，另外提出由國家擔保匯率的保證之下，將私人的短期債務轉為長期³⁴。1983 年阿根廷年通貨膨脹率高達 433.7%，投資人所等待的不再是投資上所獲得的利益，而是透過經濟的動盪，期待國家資產的重新配置。外資都有如虛幻般的並不存在，個人的存款皆以美金蓄存以防披索(Peso)貶值，外銷農作物的稅收也無法補助國內的經濟。³⁵

以上的種種改善措施已經無法紓解國內當時的經濟窘境，再加上政治上的失勢、福克蘭群島戰爭的失敗和社會動盪不安，罷工、遊行、示威活動不斷，迫使軍政府不得不交出政權，還權於民。而就在經濟混亂、政治不穩、社會不安的局面下，新的民選總統阿芳辛(Raul Alfonsin)上任了。

³³ James D. Rudolph, pp. 130-132.

³⁴ Daniel Muchnik, pp. 140-143.

³⁵ Davide G. Erro, *Resolving the Argentina Paradox-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1966-1992* (Colorado, US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3), pp. 133, 135.

第三節 小結

蘇聯與阿根廷最大的差別就在於一個為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則為軍政府主導的官僚威權國家。但無論是社會主義也好，官僚威權國家也好，僵化的體制都容易導致社會不安和官僚腐敗。蘇聯在經歷了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和契爾年科後，僵化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領導下，國家所呈現的是如同一攤死水，停滯且無法進步。而在任的每一位領導人皆無法大刀闊斧的做出改革，來帶動蘇聯這個龐大的官僚機器運轉，直到戈巴契夫的出現，由上而下的推動改革，大大地改變了蘇聯之後的命運。反觀阿根廷改革則是由下而上推動的。貝龍黨被軍人奪權後，人民生活在軍政府恐怖的官僚威權統治下。但是在經濟節節衰退，生活水平節節下降，外債不斷增加之際，軍政府又不能保衛福克蘭群島使之被英國佔有，人民就對軍政府的領導感到忍無可忍，發動示威、罷工、遊行等不滿舉動，迫使當政者交出政權。

雙方國家在經濟改革前雖然有著一段相當差異的歷史背景，但在國家經濟停滯，人民基本生活受到威脅時，國家就必須面臨經濟改革的難題。經濟改革對於任何國家來說都是一項極為艱鉅的大工程，都會遇到來自各不同層級的阻礙力量，因為在改革的過程中必定有某些特定的團體或人員的利益受損，因此如何能為產業創造有利的環境，讓經濟進步都成為當權者重要的課題。就蘇聯方面，無論是因為背負著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型態的教條，或因為領導人個人因素的考量，赫魯雪夫、布里茲列夫、安德洛波夫和契爾年科，都無法有效的做出經濟改革，所有的改革只是在基本的框架下做出調整，並無結構上的更動，因此所伴隨而來的結果並非如所預期的，而改革結果自然也就成效不彰。

戈巴契夫上任後雖然對嚴重的經濟問題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但戈巴契夫身邊的經濟學家只懂得一種經濟系統，所以他的經濟改革也只能在原本的框架下做出修正與調整，但又如學者西路尼所言“蘇聯的官僚體制過於龐大，只能完全的刪除或摧毀無法重建”。所以當經濟改革不見成效，受到阻力，戈巴契夫就認為必須先做出政治改革，在政治上戈巴契夫改革了共黨，但卻又不夠深入，因此失去了許多機會納入更多民主夥伴來認同他的重建。他在政策上反反覆覆的行為，一方面不願見到共黨分裂，一方面又想有一番作為，因而猶豫不決；

同時他不願與反對者決裂，卻也不願為改革派打開合作的大門³⁶，讓他在最後被完全的孤立。而他的經改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調整，卻都無法跳脫出統治經濟的範疇，因此官僚和企業層層相護，使市場無法真正反映需求，不同層級垂直的經濟無法有效率的與市場發生直接的關係，軟預算的制約又使企業沒有破產的壓力，因此造成資源浪費、紀律散漫。而戈巴契夫的改革，嚴格的說起來應該是努力的使老舊規則活化，但計劃的改革卻無法解決基本結構上的問題。³⁷

而阿根廷方面，在軍政府七年的威權執政下，雖然試圖開放市場，但卻因為無法堅持其政策的穩定性，又對市場過度干預，赤字節節高昇，習慣性的舉債，使外債在這七年間增加了三倍之多，進口的鼓勵也嚴重的衝擊到了國內本土的產業，福克蘭群島戰爭更是讓國庫嚴重耗盡。軍政府的執政無法為阿根廷帶來新氣象，反而是摧毀了本土工業，增長了外債，讓阿根廷之後的命運崎嶇坎坷，而外債也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

³⁶ Jonathan Steele, *Eternal Russian: Yeltsin, Gorbachev, and the Mirage of Democracy*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2.

³⁷ Peter J. Boettke, p. 42.